

张元济与《宝礼堂宋本书录》

杜泽逊

张元济先生是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和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就张先生与《宝礼堂宋本书录》的关系及《书录》在版本目录学上的地位谈谈粗浅的认识。

一、张元济与宝礼堂主人潘宗周

潘宗周（1867——1939），字明训，广东南海人，少时供职上海洋行，后充英租界工部局总办。^①自谓早岁“尝闻长者言吾粤筠清馆吴氏、海山仙馆潘氏、粤雅堂伍氏、持静斋丁氏、三十三万卷楼孔氏藏书之盛，未尝不为之神往”。中岁获交宜都杨惺吾（守敬）、华阳王雪澄（秉恩）、吴兴朱彊邨（祖谋）诸先生，“目睹其琳琅之富，丹铅之勤，则又窃窃焉羨之”。其友甘翰臣偶获蜀刻《史记》半部，持以相示，潘氏见其“精美夺目，入手不忍释，于是慨然有收书之志”^②。潘氏收书自南宋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礼记正义》始，该书为三山黄唐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时所刊，故世称“三山黄唐本”，旧为曲阜孔继涵所藏，由孔而归盛昱意园，复经景濂（朴孙）转归袁世凯次子袁寒云（克文），海内传为孤帙。洪宪败后，寒云走寓沪上，以资斧不继，持售潘氏。潘氏获此瑰宝，适新居落成，因颜曰“宝礼堂”。同获者尚有南宋建安余仁仲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然潘氏收书特为谨严，每估人挟书登门，辄就张元济先生“考其真赝，评其

高下，苟为善本，重值勿吝。但非宋刻，则不屑措意”^③。若未经张氏过目，则“宁肯割爱”^④，绝不贸然购进。潘氏“财力充足”，又“甚爱古书”^⑤，复经张元济先生之助，所以二十年中竟获宋本一百一十一种，元本六种，都一千零八十八册^⑥。自谓“综其所得，亦略与堯圃相埒”^⑦。但潘氏所藏，均储之工部局保险柜，故外间万难一见^⑧。这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傅增湘致张元济先生的信可以得到旁证：“顷闻瞿氏以宋版书籍二十七部，皆目中所载完好精善者，向潘明训（诵芬为之作缘）质银四万两，月息九厘，以六年为期，届时不赎，即归押主。此等古书，一入金匱石室，便有长门永巷之嗟，无复再见天日之日，可叹也。”又云：“石室之深严，公所知也，拜观且不易，何论流传？”^⑨为了贵重书籍的安全而采取必要的保险措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潘氏已超出了这一限度，几乎秘不示人了。但是，对张元济先生则完全不同，潘氏不仅要给他看，而且要首先给他看，不经他过目，潘氏不敢轻信，足知潘氏对张先生是多么推崇和信任。潘、张是同岁人，能如此信任，是异乎寻常的。潘、张关系较密，还可从以下几件小事窥其一斑：

民国八年十月十八日，潘宗周约张先生在大观楼晚餐，出示宋本《鱼玄机集》、《韦苏州集》、《李贺歌诗编》，又《周礼》，并询及影印旧书办法^⑩。

民国十二年瞿启甲（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主人）赠潘宗周《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及《中原音韵》各一部，托张先生转交^⑪。

民国十八年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运天津，有待价而沽之意。为防珍本外流，叶恭绰、张元济、傅增湘、李拔可、刘承幹、赵叔雍等成立“古籍保存会”，拟集资四万元购买杨氏书。潘宗周为成员之一，他认为三万九千元价过昂。叶恭绰曾为此致函张元济先生，“请先生再致潘一信，以释其疑”^⑫。

民国十九年，潘宗周欲购傅增湘所藏《白孔六帖》、《龙龕手鑑》等，委托张先生函商。^⑬

民国二十五年，张先生致函丁英桂，云从潘明训处借得宋本算书两本，拟印入《续古逸丛书》^⑭。

当然，潘氏对张先生也并非全无保留。当张先生“驰书四出”^⑮，访求正史善本，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之际，《史记》拟用南宋黄善夫刻三家注本，但此本国内久佚，清末荆州田吴炤（伏侯）游东瀛，始获残帙带回，不久散出，宣统季年为正文斋书铺析而售之，大部为张元济先生收归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共六十六卷^⑯，袁克文得三卷（《平准书》、《河渠书》、《刺客列传》）。民国四年乙卯袁以《河渠书》赠傅增湘，傅报以宋绍熙四年吴炎刊《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一卷^⑰。其《平准书》、《刺客列传》两卷则为潘宗周所得。傅氏所藏于民国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托陈叔通带给张元济先生，而潘氏二卷秘不示人。傅氏曾于民国十九年四月函告张元济：“抱存（按：袁克文，字抱存）有数卷，恐在潘明训处。”^⑱同年五月又函告张元济：“潘明训家有残卷，正文斋所扣留，与尊藏本衔接。”^⑲而张元济先生同年六月三日复傅增湘函云：“黄善夫《史记》残本潘君从未谈及，或以为残本不甚重视，亦未可知。”^⑳实则，以潘氏收书标准之严，此国内久佚之本，虽残帙，亦不致轻视。是时，潘氏正托张先生介绍购买傅增湘所藏《白孔六帖》、《龙龕手鑑》，谅亦不乏接触。可见，潘氏即使对张先生也不无保留。而张先生对潘氏虽“财力充足”而“不肯出价”亦早有微辞^㉑。其实，作为商界人士的潘宗周，要收藏古书，不靠上一位行家是不行的，而要他完全依靠某一个人，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张、潘关系就是如此。直到次年（民国二十年）一月张先生才得知日本上杉侯爵有黄本全帙，并借照所缺半部，使《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全用黄善夫刻本作底本，而不再以明王延喆刻本

补配。^②

二、张元济与《宝礼堂宋本书录》

《宝礼堂宋本书录》四册，是民国二十八年三月由商务印书馆代为排印的，前有张元济先生序，畅论宋版之美善，末云：

“（潘君）因综所得，辑为宋本书录，既成示余。”又潘氏自序，但言收集宋本经过，只字未提《书录》及其与张元济之关系。即各书提要，亦均用潘氏口气。如《礼记正义》提要云：

“余友张君菊生曾往展阅，归后语余，确为黄唐刊本。”又《史记集解附索隐正义》残本提要云：“余友张菊生得六十余卷以归涵芬楼，余所得者仅此《平准书》、《刺客传》二卷而已。”故诸家著录均云潘宗周撰，几不知其出张元济先生之手。

在《书录》印出的第二年，张先生的好友郑振铎就有这样的记载：“《书录》出张菊生先生手，甫印就，潘明训君即下世，其嗣君乃封存之，故传世绝罕。余尝托菊生先生索取一部，竟不可得。数月后，李紫东乃以一本见贻。惟书录卷帙稍繁，披览不易，余乃手录其目为一册，俾时自省览焉。”^③从道理上讲，郑氏此言可信，因为潘氏之书什九经张先生过目，张先生无疑是撰写《书录》的首选。但毕竟缺乏实证，难以服人。幸张先生民国二十六年日记尚存残稿，其哲嗣树年先生主编《张元济年谱》已将这一珍贵史料采入，今据《年谱》所载，可知张元济先生陆续向潘宗周提交《书录》稿有以下记录：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致潘明训书，送呈《武经龟鉴》、《名贤文粹》、《舆论广记》（按：“论”当作“地”）、《古三坟》、《荀子句解》、《湘山野录》、《伤寒明理论》七书题跋。

九月二十六日，偕王云五访潘明训，面交第六次宋本书题跋稿七种。

十月三日，潘明训来访，面交第七次已撰宋本提要七种。

十月十四日，访潘明训，交第八次宋本提要十一种，连前共六十八种。

十一月八日，访潘明训，交善本提要十种。

这些记录足以说明，郑振铎的话是完全可信的。同时，从交稿日期及速度推测，《书录》稿当是在民国二十六年一年之中完成的。潘氏哲嗣潘世兹先生《重印书录前言》谓“历时数载，费尽心血，方告脱稿”当是推测之辞。因为当时他还在国外留学，民国二十八年才回上海，执教于圣约翰大学^{②4}，次年七月三日张元济先生复叶恭绰函即谓“其子世兹现在香港”，并开去介绍信，请叶恭绰“就近商榷”向潘氏借印《武溪集》事宜。可知是时潘明训已下世，而潘世兹仅在上海留一年即赴香港，《书录》撰写原委恐不能尽明。

《书录》稿交潘氏后，潘氏或有所修改，故迟至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潘明训才托商务印书馆排印《宋本书录》。张元济先生次日即致函丁英桂，嘱排样张，并规定用“仿宋长体”字、“连史”纸。隔一日（即二十九日）又致书丁英桂，谓“样张稍有改动……请改排”。十一月三日再致函丁英桂，嘱排《书录》各家藏书印记细节：“文字疏密大小各印不同，又与他印相隔上下左右务要配置得宜，此项工作须请上手办理，切勿任意草草从事。”十九日复致书丁英桂，嘱本月务将《书录》史部排完，“务祈督促为幸”。二十七日，张先生对子部稿尚不满意，于是致书丁英桂，谓“子部中尚须加校勘记”，“兹送去集部稿计三十七种，请属先排为幸”。可见直至排印期间，《书录》还在增订修补，以期完善。到次年（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书录》终于排定，是月二十二日张先生晤潘宗周，商定《书录》用纸、书签规格等事，并于次日函告丁英桂印制事宜。二月一日，张先生写定《宝礼堂宋本书录序》这篇版本学的不朽论文。三月二十

二日函告丁英桂：“潘君欲托本馆代售，本馆不能答允，故版权页上售价及寄售处均不能印，只须载出版年月及出版人（用南海潘氏宝礼堂）及此书有版权不许翻印字样。”^⑤《书录》出版当在是后不久，检初版《书录》卷尾，正印“中华民国廿八年三月南海潘氏铸版印造”字样，其来历就完全明白了。而《年谱》将《书录》出版系于二月，似与事实不符。郑振铎云“甫印就，潘明训君即下世”，则潘宗周当卒于民国二十八年四月至六月间。

由此看来，《宝礼堂宋本书录》从撰写到出版均由张元济先生一手承办。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此书，版权页上题“潘宗周、张元济撰”，显然不妥，似应改为“潘宗周藏、张元济撰”。

三、《宝礼堂宋本书录》在版本目录学上的地位

一部好的版本目录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体例善，二是考订精。《宝礼堂宋本书录》可谓兼有两美。

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源远流长，尤其清代和民国，大家辈出，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但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藏书百年不散者代不一二，其当世即星散无遗者屡见不鲜，这就促使藏书家及时编目，以垂久远。藏书家之重版本自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始，然专重宋版则自明代始，万历间赵用贤纂《赵定宇书目》^⑥，分类二十有九，中有“内府板书”、“宋板大字”、“元板书”三类，当为以版本性质划分图书类别之嚆矢。清乾隆中，于敏中等奉敕纂《天禄琳琅书目》，嘉庆初彭元瑞等又奉敕作《后编》，其例以宋、金、元、明刊刻时代为序，每书“首举篇目，次详考证，次订鉴藏，次牖缺补”。其“考证”专详锓梓年月及藏家题识印记，并考藏家生平，著授受源流^⑦。即其体例而言，可谓版本目录的榜样。但其书专重版本之形式，亦即文物

价值，不重其校勘价值，因此只能是鉴赏一派的典型。然前贤所以重旧本，尤在去古未远，足正时本之谬，故自黄丕烈、张金吾以下，于搜奇探隐之中，未尝不斤斤于字句之得失、校讎之精粗，此版本目录之学所以胜于清初诸老也。张氏有《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十卷，著录宋元旧槧、旧抄及前贤手校之本而有关实学、可资校讎者765部，于版本之优劣、抄刻之异同，均详考之，前贤序跋题识均迻录之，《四库》无提要者补作之。总之，既重版本又重内容，在当时可谓最完善之作。黄、汪而下，清末有所谓瞿、杨、丁、陆四大家，各有目录，均不失爱日精庐轨辙，要以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为最上。仿其制者，有张钧衡《适园藏书志》（缪艺风代撰）。其例已远较张金吾加密，大抵先叙版式（包括首行、次行题款，卷首序文，序末、卷末刻书题识，序文、正文行款，版心大小字数，有无刻工姓名，经、注、疏排列方式等），次列讳字，次述校勘价值，末以双行小字罗列各家印记。前贤手跋题识亦详载之。其有特殊校勘价值者，往往附载详细校勘记，乃自来版本目录所无，为例尤善。

《宝礼堂宋本书录》正是集诸家之长而撰成的。就其体例而言，每书均先作提要，考该书之流传、刊刻及此本之授受、优劣；次载前贤手跋题识；次述版式；次列刻工姓名（包括单字）；次列避讳；次列藏印（略依原款而楷化）。以上诸项，前人基本都涉猎到了，但求其完备如此者则无。例如讳字，久已为版本学家所利用，但诸家目录仅在鉴别刊刻时代时才罗列诸有关者。如南宋余仁仲万卷堂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仅云“殷匡贞桓完慎皆阙笔”，《宝礼堂宋本书录》则较全面地罗列讳字，益出“玄弦弘泓徵”五字。再如版式，仍以《公羊解诂》为例，《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不记其版匡、版心，《宝礼堂宋本书录》则详述云：“左右双栏，版心细黑口，双鱼尾，书名题公羊几，上记大小字数，亦有不记者。”当

然在另外一些提要中,《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也记版心,如《监本附音春秋谷梁传注疏》提要云:“版心有大小字数、刊工人名。”但既非定例,又极简单。再如刻工,也是久为藏书家利用的鉴别版本的标准之一(黄丕烈即用过),但或者偶一用之,或者仅列与鉴别该书有关者。《宝礼堂宋本书录》则明标“刻工姓名”一项,全面罗列刻工姓名,即使单字也不遗漏,这是旧来版本目录从未有过的体例。刻工姓名在版本鉴别上的作用是晚近才得到充分利用的,相传为宋绍兴中蜀刻的大字本“眉山七史”,张元济先生发现其中《宋书》的刻工与浙刻《春秋左传正义》的刻工相同者多至数十人,其余六史同者亦夥,于是怀疑“其版心画分五格者殆为蜀中绍兴原刊,余则入浙以后由宋而元递为补刻也”。^②赵万里先生则进一步据此认为传世的所谓“眉山七史”并非绍兴中眉山原刊,而是浙江重刻者^③。因此,罗列那些宋本的刻工,对鉴别所有同时代的版本都有重要参考作用。本世纪三十年代董作宾发明了利用贞人鉴别甲骨文年代的科学方法^④,其道理与利用刻工鉴别版刻年代是完全相通的。因此,张元济先生在《书录》中罗列宋版刻工的做法是完全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他把“刻工姓名”明定为版本著录项之一,这在版本目录学上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发明。另外,《书录》在罗列讳字、刻工等项时,对原刻、补刻或配补均尽可能区别对待,如《资治通鉴纲目》提要,于“刻工姓名”项首列原刊刻工,次列“专见于卷九一册者凡五十四人”,次列卷四十六补配本刻工五人,次列卷四十七至五十一补配本刻工六人。“版式”、“宋讳”、“藏印”诸项也如此处理,这就使版本著录更细致、更清晰了。

著录印章,《天禄琳琅书目》首开其例,而且皆摹旧有之形制款式,惟将印文楷化而已。其后诸家罕有继承其例者,《爱日精庐藏书志》但云有某某图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亦仅以双行小字注出有某某朱记。“图记”、“朱记”云云,大概都是

为区别原版摹刻之印记而设的。从这些著录中只能了解印章内容，却无从了解其特征。张先生在相隔一百六十年之后，独能继承《天禄琳琅书目》之法，详细罗列诸家印章，并略存原印款式及大小。所不同的是，《天禄琳琅书目》均于印文之外勾摹原印形状，《宝礼堂宋本书录》则无，大概是排印不如刻版方便吧。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宝礼堂宋本书录》在体例上确是广泛汲取了前人的长处，同时又进一步完善化了，除了印章一项不摹形状又不区别朱文、白文是其小疵以外，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至于考订之精，则是更容易发现的。首先，宝礼堂的书什九是张先生鉴别后才购进的，所以早在潘氏请张先生撰《书录》之前，张先生对这批宝贵的文化遗产就了然于胸中了，这也正是张先生可以在一年中而且在事情繁多的情况下完成百余种宋元本提要的原因。张先生的第二个优势是一流的鉴别水平。当张先生撰写《书录》的民国二十六年，他已是七十岁的长者，从光绪三十年（1904）经蔡元培介绍收购绍兴徐树兰熔经铸史斋五十橱藏书以来，张先生已与中国古书打了三十余年交道，其间除大量收购善本古籍外，还次第校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善本丛书千数百册，简择之严，校勘之精，海内无与伦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张先生积累了丰富的版本鉴别知识，成为当时一流的版本学家。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件事中加深认识：

民国二十六年，即撰《书录》的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张先生全天在炮火中为叶景葵整理藏书。当时叶氏因兴业银行公事赴武汉，张先生恐叶氏藏书毁于战火，故主动承担这一任务。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鉴别完毕，图书获全。嗣后叶氏致张先生书云：

“将来事定后，拟选择可以保存之价值者，请公再为鉴定，编一清目，想亦大雅所乐闻也。”^⑤叶氏为银行家，但喜藏书，“尤笃好稿本、校本”，于版本鉴别造诣颇深，撰有《卷庵题跋》，

“鉴别前人墨迹最精审”^②，他是张先生最好的朋友之一。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图书馆长蒋复璁秘密来沪，委托张元济、郑振铎等利用退还的中英庚子赔款为中央图书馆购买散出的古籍，以防珍本外流。经蒋复璁、何炳松、郑振铎等商定，由郑振铎、张凤举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张寿镛负责保管经费^③。经过三年努力，所获宋元刊本各在百种上下，明刊本竟逾三千，批校本、名家手抄及题跋本为数更多，仅黄丕烈批校题跋本就有百种之多。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掠夺中华文化遗产的情况下，张、郑诸公为防止古籍珍本外流立下了汗马功劳。

商务印书馆首任编译所长是蔡元培，张元济先生为二任，第三任则为王云五。王氏自谓“与菊老为忘年交，无话不谈”。据王氏回忆，当年张先生曾对他开玩笑说：“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兹以远离善本图书荟萃之故都，或不免稍逊傅沅叔矣。”^④虽系玩笑，却道出了真情。傅沅叔经见善本固在张先生之上，而考校之功则下之，民国间言版本者，殆无出二人之右。

版本之外，张先生又是一位一流的校勘学家，他最富代表性的成果是《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这部煌煌巨著当时没有随《衲史》印出，张先生仅撷其英华撰为各史跋尾，嗣又“觉后跋所遗材料尚属不少，略加整理，仿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之例，共成百数十条”^⑤，成《校史随笔》一册排印行世，自谓“十年心血，不无敝帚千金之意”^⑥。蔡元培曾致函张元济云：“购得大著《校史随笔》，拜读一过，虽未及检各史对勘，而正伪补夺，厘然有当于心。若举百数十册之校勘记次第整理印行，则吾哥博览精勘之成绩，所以嘉惠学子者益无限量。”^⑦张先生通过大量有系统的校勘实践，在方法上也形成了独到的见解。他既主张保存古书原貌，又不死守宋元刊本之旧，认为“原本讹误，不必曲从”^⑧，因此，他在校勘学上是死

校与活校的结合者，既注重利用宋元旧刊，又不遵奉一字不改的古训，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对乾嘉精神的最好继承。

以张元济先生在版本鉴别及古籍校勘上的造诣及对潘氏藏书的特殊了解，撰写《宝礼堂宋本书录》所能达到的水平是不言而喻的。随举一例，南宋孝宗时刊《东坡集》残本三十册，卷二十四以下卷第被书贾剗改颠倒，张先生以成化本正之，发现实为卷三十三、卷三十五至三十九。此书旧为汪士钟所藏，检汪氏书目，却无卷二十四、卷三十五，而有卷三十二。验之原书，卷二十四、卷三十五实有汪氏藏印，张先生据此发现汪氏著录有误。此书明成化四年程荣刊本为“东坡七集”之祖，向称精善，传世最稀。宣统中，端方曾以江南图书馆新收丁氏八千卷楼藏本覆刻于金陵。丁氏原本有阙误，复经缪艺风以家藏钱求赤校宋残本合校之，仍有不足，则以嘉靖本补完^①，是为“东坡七集”最完善之本。张先生取宝礼堂残宋本校之，复得足以正其讹夺者十数事，列为校记，附载提要之末。在《宝礼堂宋本书录》中，这类辨证前人失误、校订时本错讹的精彩例子随处可见。潘氏书已由哲嗣潘世兹先生捐献国家，今藏北京图书馆，屡经考校著录，迄未发现鉴别之误，也可从一个侧面证明张先生的鉴别水平。

至于《宝礼堂宋本书录序》在版本学史上的不朽价值，张树年先生已有专文讨论^②，兹不赘述。

总之，无论就体例，还是就考订来衡量，《宝礼堂宋本书录》都是堪称典范的善本目录。这部善本目录是张元济先生一手写定的，足以反映张氏在版本目录学上的卓越成就。

注：

①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周退密、宋路霞《近代上海藏书纪事诗》，载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89年第4期。

②⑦ 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自序》。

③张元济《宝礼堂宋本书录·序》。

④⑥潘世兹《重印宝礼堂宋本书录·前言》。

⑤②①民国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载《张元济 傅增湘论书尺牋》，以下简称《尺牋》。

⑧《近代上海藏书纪事诗》。

⑨⑬⑱⑲⑳《尺牋》。

⑩《张元济日记》，1981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⑪⑫⑭⑳⑳⑳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1991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以下简称《年谱》。

⑮傅增湘《校史随笔·序》。

⑯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按：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作六十九卷，恐误。

⑰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

⑱《年谱》349页。按：柴德赓《史籍举要》认为《衲史》中《史记》仅六十三卷用黄本，余以王延喆本配补，误。

㉓《西谛书话·西谛题跋》。

㉔梁战、郭群一《历代藏书家辞典》。

㉕均见《年谱》。

㉖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稿本。

㉗《天禄琳琅书目》卷首。

㉘张元济《校史随笔》。

㉙赵万里《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民国二十四年中央研究院出版。

㉚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同上。

㉛顾廷龙《叶公揆初行状》，载《叶景葵杂著》。

㉜王云五《涉园序跋集录·跋》，载197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涉园序跋集录》卷尾。

㉝《年谱》456页，赵翼误为赵巽。

㉞《年谱》468页，正伪疑正讹之误。

㉟张元济致郑振铎函，见《年谱》468页。

㊱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明成化程荣刊本东坡七集跋》。

㊲张树年《〈宝礼堂宋本书录序〉简介》，载《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古籍所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